

# 葛剑雄：我最大的特点是知难而退

■文/文汇报记者 李念

1994—1995年的春夏秋冬里，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一直在埋头做一件大事——撰写导师谭其骧、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的传记《悠悠长水》。

第五章“编《禹贡》始末”一节，共用了14页。在学界，大家都知道1934年2月，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邀请高足谭其骧一同成立旨在研究中国沿革地理和相关学科为宗旨的“禹贡学会”，并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但第二年暑假，因为治学、处世、为人的歧见，这对“黄金搭档”师徒北南遥望，《禹贡》主编易人，顾颉刚在日记中再发“才难”之感。

对于当时的这段纷争，葛剑雄列举了顾颉刚写给谭其骧的两封三千余字长信，也引用了与导师相处时的追问和确认，最后，葛剑雄在传记中引用顾颉刚的信：“龚定庵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拿适之先生的话来说，开风气者是敢做大胆假设的，而为师者是能作小心的考证的……我是偏于开风气，你是偏于为师……”接着葛剑雄这样“知世论人”：谭其骧无条件选择质量而脱期，“作为作者，这应该是很大的优点；但作为编者，这无疑致命的缺点。不幸，顾颉刚选择他（谭其骧）当了编者。”

2015年的3月28日早晨，记者在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办公室提起当年太师和先师的分歧时，他说，“他们是和而不同。”在起身准备去参加9点30分一个开班仪式时，记者追问，您怎么看别人对您的各种评价，葛剑雄看了看满桌满榻的书和一叠即将捐赠出去的专业书籍，发表了“自评”：人不可能超越时代，人也不可能超越他自己，我之所以能做出些事情来，最大的特点就是我能知难而退，就是要有取舍和平衡，现在做的事情都是合适我并能做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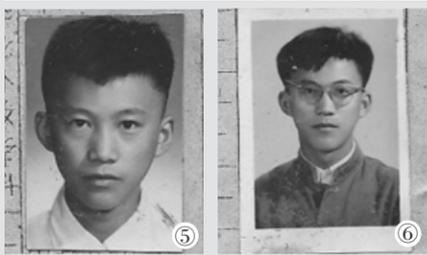
## 对前辈学问人格的同情理解

葛剑雄是知名的历史地理学者，还是连任两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并以“敢于说话”而闻名，2012年在全国两会上“喊话”教育部长袁贵仁，要求公开考研泄题调查，被媒体冠以“葛大炮”。在一篇题为《我也有双重人格》的人物访谈中，被问及双重人格是否是体制内人的通病时，葛剑雄说：“不让自由发言，不要人性自由表达出来，就容易导致双重人格。我也有双重人格，不可能完全做到随心所欲，有些真话在某种场合就不说了。”

## 先师谭其骧70岁申请入党

对于1957年进初中、文革中担任中学教师的葛剑雄来说，这样的话既带着历史学者的史见，更带着自己的体验，尤其是对老一辈学者学术经历的理解和参悟。

葛剑雄和先师谭其骧的关系是学术史上较为特别的。在研究生开读的第二年，历史系便让他担任谭先生的学术助手，留校后依然如此，直到谭其骧走完学术生涯和生命终点。谭其骧先生的传记，前传在1997年出版，后传在2003年出版。直到201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葛剑雄七卷本文集作为七十周年纪念时，很多读者才看到合在一起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修订版。在第十七章里，葛剑雄详细描述了谭其骧的入党前后，1980年7月1日，在建党59年之际，谭其骧表达了入党的愿望，那年，谭其骧70岁。在1983年的《党的生活》中，谭其骧解释了作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何此时争取入党。“三中全会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影响了历史学界……忠于党和忠于学术是一致的了”。古稀之年的肺腑之言和勇气，令历经新中国20余年中无数次运动的同龄人叹为观止。同为燕京大学校友的历史学家周一良来信祝贺，信中说：“夏鼐兄入党，谓宜先以党员要求自己，再以专家要求。但回顾三十年的自己，凭专家之科学良心办事时分嫌少。”



①1981年5月与谭其骧、周有光及夫人张允和  
②1983年夏，博士学位典礼，谭其骧（中）、周振鹤（左）  
③今年春节，与女儿同登乞力马扎罗山4800米高峰，图为父女俩与向导  
④在欧盟总部演讲 ⑤1960年进入市北中学高中 ⑥1964年高中毕业

己，再以专家要求。但回顾三十年的自己，凭专家之科学良心办事时分嫌少。”

在写这些章节时，葛剑雄文笔非常简练，颇有太史公之风，但均以周全和严谨的史实为据。11年后的2014年春天，《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记者引用了葛剑雄1980年代在某座谈会上的一段话：“我是学历史的，我知道并承认历史规律。我跟外国人讲，世界上的共产党没有一家是被你们打垮的，古巴在美国边上，美国没有干掉它，要垮都是自己垮的。我不会因为今天要求入党，明天早上就来打扫卫生；我也不会因为不让我入党，就反对共产党。”葛剑雄这个答案也用来回答了海外的不解——你为何一定要听共产党的，为何不听导师的？在引述这些问答时，葛剑雄坐着的椅子来回旋转了30度，“谭先生认识很清晰，旧社会学也做不成，共产党领导顺应了历史潮流，我是不会反体制的。”对于经历文革的他，最大的体会是：个人很难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命运的是历史大趋势和机遇；没有机遇，单靠个人的努力是很难成功的。而且个人的“安身立命”不仅是精神意义上的，也是世俗意义上的，离开后者，前者也无从谈起。

## 汲取“双重人格”的教训

1971年，葛剑雄在古田中学担任英语老师。10月，林彪在蒙古坠机身亡的消息传出，文件中传达了一封信以证明领袖在1966年就有所察觉，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偶然机会读到了内部书《第三帝国的兴亡》，他欲罢不能看了多遍，对现实产生了怀疑：领袖不是神，并非永远代表着真理。他开始反思更深刻的问题。文革之初，他以最大的热情响应领袖的号召，但之后各种“白天是保皇派，晚上就可变成走资派”的标准不一的运动中，让他对“既要当革命的动力，又要当革命的对象”的理论渐渐产生怀疑。“有时，白天批斗了某位教员，晚上，也会觉得有些过分和不安。”在记者的采访中，葛剑雄坦言自己并不是“张志新”式的人物，但那个年代在受时代政治思潮裹挟时，不能不说，自己既有些私心，也会有心灵的拷问。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时，葛剑雄撰文《时代性的人性扭曲——“文化大革命”中的双重人格现象》，文

末写道：双重人格不是文革的产物，双重人格的普遍化在‘文革’中达到高潮，也为文革推波助澜……三十多年了，我们告别双重人格的时代了吗？记取由此引发的教训，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 有批评能力时我才谏言

读了这样的反思，或许就容易解读葛剑雄在公共领域的为人处事。在担任图书馆馆长时，他为何从厕所用纸、走廊有热水、抵制图书回扣等抓起，也不难理解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谏言，所谓的“喊话”教育部长，每次小组会议第一个发言，用内参方式表达对南海争端、钓鱼岛风波的看法，“我若有能力发表我的批评并对社会起积极作用，我就会谨慎和理性地提出。”葛剑雄坦言。

在经历了那个扭曲时代后，葛剑雄的言行背后有着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尽一己之力的诚挚。如他的一位学生所评价的，“如果他这样的学者不对公共事务发言，这个社会就会充斥着另一种公知。”

## “不拘一格”的受益者和反馈者

“决定命运的是历史大趋势和机遇。”这句话，是葛剑雄对历史的总结，同样也是他自己的际遇。葛剑雄称自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政策的受益者。

## 从南浔的识字缘到1978年考上复旦研究生

葛剑雄自小就对认字着迷。他出生在江南名镇南浔，家中仅靠父亲的手艺收入支撑，常常只能买黑面粉和吃菜粥度日，姐弟三人虽然上学，但葛剑雄常害怕因为晚交学费而被赶出教室。他4岁9个月便随姐姐去圆通小学（后吴兴县南浔镇浔北小学）读书，没钱买书，就把糊墙用的“申报纸”上的字读完。姐姐上了初中，他便囫圇吞枣地读姐姐教材里的文学课本。“学而时习之”能背得滚瓜烂熟，却不知其

义。1956年，全家搬迁到上海，没书的局面逐渐改变，一本石印本的《唐诗三百首》，记性颇好的他几乎读熟能背了。他兴趣广泛，学过美术，做过航模，练习过无线电收发报，参加过市级数学竞赛。

1960年，他考入市北中学读高中，便立下了考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志向，于是，他的课余时间全部用来阅读文史古籍，文言文写作，编撰历史工具书，等等。他购得了王力的《诗词格律》，后又买得《汉语诗律学》，虽然自己觉得“连一知半解也称不上”，但还是打下扎实功底。高二时，他被查出浸润型肺结核而休学一年。葛剑雄至今难忘市北中学的老师给他的鼓励和学习上的小灶。语文老师田楚明以她的名义借出供教师专看书籍，后来又和历史老师毛仁村争取到了让他使用阅览室和外借教师用书的特权，化学老师瞿佩荃向华师大当教授的父亲咨询市北中学没有的书籍；《资治通鉴》、前四史以及一些文学古籍就是那时通读的。英语老师鼓励他排英语短剧《东郭先生和狼》，后来自学了高三英语。因此，到古田中学工作后，就教了英语，在上外的夜大学直接考入二年级。由于有读书的乐趣和能力，在“文革”中也能以“支援世界革命”、“批林批孔”、“评法反儒”的名义学英语，阅古籍，看内部书。葛剑雄清晰地记得，《毛泽东语录》和《毛泽东选集》英语版出来后，他不久便翻阅在手了。

到1972年，葛剑雄在闸北区教育系统已经是颇有名气的“一支笔”，重要的文章都由他起草。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因为超龄几个月再次无缘高考。但第二年恢复的研究生招考，并不设学历门槛，年龄放到40岁，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已是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市人大代表的他走进了考场，结果以历史系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

儿时与文字的分缘自此再次续上，葛剑雄走上了学术之路。

## 从全国首批文科博士生到史地所的新掌门人

由于有着较好的基础，葛剑雄很快脱颖而出。“校、系领导和导师也破例给了我很多机会。”在2003年，首批获博士学位二十周年感言中，葛剑雄回忆了自己因为破例的机会带来的收获。1978年10月入学后一年，系里便安排他担任谭先生的助手。从1980年起，葛剑雄陪同出席各种重要的学术会议和工作会议，如科学院学部（院士）大会、国务院学科评议小组会议；协助他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国家历史地图集》，撰写学术传略，仅1982年，便随谭先生去外地13次。从中不仅学到了具体的历史地理知识，了解了治学方法，也感受到导师品格。

1982年春，全国首批博士生招考，留校工作的葛剑雄又破例被录取为在职博士生。而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也在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国第一篇正式出版的文科博士论文。1983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学校又破格批准葛剑雄提前毕业，8月间，由侯仁之、史念海、杨向奎、吴泽、杨宽、胡道静、陈桥驿七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通过了博士论文，葛剑雄和同届同学周振鹤成了全国首批文科博士生。

更让他感慨的是，在陪同谭先生十几年期间，葛剑雄得以瞻仰了大多数老一辈史学家的风采，得到他们的教益和帮助，“这在几届研究生中有如此机会的，全国大概只有我一人。”所以，当谭其骧先生去世后，闻知葛剑雄要写谭其骧学术传略时，前辈学者也纷纷赠予历史书信。葛剑雄也由此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和财富。

与谭其骧年龄相差10个月、有同窗之谊的北大教授侯仁之先生，是历史地理学界中西贯通的第一人，取得燕京大学硕士后在利物浦大学获博士学位。在撰写谭其骧传记时，82岁高龄的侯（下转第三版）